

# 重新認識魯迅

◎ 王潤華

## 一 只能容納魯迅革命形象的故居

1989年5月下旬，我在天色陰沉、風雨迷濛的紹興城住了幾天。雖然那時已是初夏，天氣依然是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季節。

一個午後，我走進座落在塔山南麓和暢堂的秋瑾故居。在黯暗的燈光下，我把一共三間五進的秋瑾故居慢慢看，細細的想。第二進東面的樓下，為秋瑾的臥室，室內木床、書桌、她用過的筆墨硯台、女扮男裝的照片，還有壁內密室的槍械，都是當年原物。第三、四進原為秋瑾家人的住處，現已闢為秋瑾史迹陳列室，展出她的各種遺物 and 手迹。

秋瑾故居昏暗的光線，把作為一個女革命家、女中豪傑的形象神秘化了，但卻把她作為一個人的精神面貌遮掩住了。我的眼睛所見，我的耳朵所聞（有關故居的講解），完全沒有秋瑾的家庭與婚姻生活，她被塑造成一座沒血沒肉的銅像。

我從秋瑾故家門前的和暢堂路，撐着一把雨傘，擋住滿城的風雨，慢慢步行到東昌坊口（現在改稱魯迅路二百號）的魯迅故居黑油油的石庫台門前，前後不過走了十幾分鐘。他們原來不但同鄉，還是相隔不遠的鄰居。

在這所謂周家新台門裏，魯迅誕生、渡過了幼年和少年生活。1909年從日本留學回國，第二年他回到紹興，先後在紹興府中學堂和山會初級師範學堂教書兼行政工作，一直到1912年北上期間，他都住在這所故鄉老屋裏。當1919年賣給別姓時，魯迅回老家告別，而且還把這經驗寫進小說《故鄉》裏去。

今天我們看見的新台門，是幾經修建後，魯迅本家所住的房屋而已，格局與原來的很不相同。原來十多戶周氏家族聚族而居的堂皇的新台門，大部分地段與東鄰六戶人家的土地，再加上東邊更遠的周家老台門遺址，目前已改建成紹興魯迅紀念館。

我二訪魯迅故居及其紀念館後，心中不免納悶，頭腦中充滿疑問。當

\* 此文係作者為紀念魯迅誕生110週年而作。

我很想上樓探看一下，聽說那是魯迅當年與愛妻朱安洞房的地方。他們說樓上不必看，沒有甚麼。其實我知道他們要我們忘記一個悲劇，要推銷魯迅是一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

初設計紹興魯迅紀念館時，就應該完全恢復新台門甚至老台門的全部面貌，然後就以原來的的新舊台門建築格式作紹興魯迅紀念館。魯迅小說中許許多多人物原型，包括周氏家族或非同族的外人，原來就住在新舊台門，甚至過橋台門裏。走進他的故居，走過每個空間就等於在閱讀魯迅的一篇篇小說和散文。譬如在第四進的桔子屋，我們看見周子京神經錯亂後，把房屋的地面挖開一個大洞，自然想起〈白光〉中陳士成考試失敗，發狂掘寶故事情節。可是目前修復的魯迅紹興故居，空間實在狹窄，不但容納不了眾多魯迅小說與散文中的人物與事件，連魯迅的兄弟，別的房族的人更不必說，居然也被排斥出去。我細心聽講解和觀察，周作人、周建人似乎從未居住過新台門。我很想上樓探看一下，聽說那是魯迅當年與愛妻朱安洞房的地方。他們說樓上不必看，沒有甚麼。其實我知道他們要我們忘記一個悲劇，要推銷魯迅是一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或者至少要塑造他是「無產階級的偉人」。

從秋瑾和魯迅在紹興的故居的展覽模式，我們可以具體的看見在中國，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在被肯定或否定時評價都是不够客觀，否定的往往過於誣衊，肯定的則一定以英雄姿態出現。我參觀哈佛大學校園附近的美國朗費羅 (Henry Longfellow) 故居，所見屋內的陳設，完完整整，從他自己到傭人的遺物，從書房到廚房用具，甚至食物，都全部保留。這樣我們可以從原來的生活環境中，來瞭解真正的朗費羅，他既是一位詩人，也是一位普通的公民。

## 二 髮妻朱安住房是一禁地

魯迅紹興故居目前開放參觀的那間書房兼寢室，是他從日本回紹興教書時所使用。樓上的房間，魯迅少年時代就跟長媽媽住過。1906年夏天，魯迅奉母親之命，從日本回故鄉和朱安女士結婚，新房就設在樓上。當時的情景魯迅家的工人王鶴照親眼看見，他後來回憶說①：

我第一次看到魯迅先生是1906年，這年夏天，魯迅先生從日本回來與朱女士結婚的……魯迅先生結婚是在樓上，過了一夜，第二夜魯迅先生就睡到書房裏去了。

魯迅回家結婚時，周作人不在家，周建人親眼目睹婚禮與魯迅對婚姻的失望。他在《魯迅故家的敗落》(1984)有較詳細的敘述：

婚禮照例是在新台門大廳裏舉行的，二哥說要回來，但還沒回來，除了三個台門裏的本家，很少有甚麼客人來，也不演戲，一點也不熱鬧。也許由於我大哥的意見，我母親一切從簡，只是在儀式上，還是照舊，由老台門熊三公公來祝壽，還是拜堂，我大哥裝了假辮子，真是活受罪。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信，統統都是白寫……

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難形容的……

(頁240-43)

魯迅的一位堂叔周冠五也在場，他在1962年回憶說②：

結婚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魯迅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紹興新台門故居在1919年賣掉後，魯迅親自回鄉把家人接去北京。魯迅與朱安在北京一直住在同一屋簷下，雖然不共宿同眠。一直到魯迅在1926年8月底南下廈門和以後在上海與許廣平同居，才沒有住在一起，不過魯迅一生都負起贍養她的責任。朱安在1947年逝世時（那時魯迅已逝世十一年了），還是住在北京魯迅的最後的故居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房子裏<sup>③</sup>。這房子目前已修飾一新，並且成為北京魯迅紀念館，魯迅的寢室兼工作室被稱為「老虎尾巴」或「綠林書屋」，《野草》、《彷徨》和《朝花夕拾》中的一些作品，都在此創作。魯迅的睡房在東邊，朱安的臥室在西邊。自從1956年，在好幾處魯迅住過的房屋中，選了西三條這所定作魯迅北京故

居，其東側又建了魯迅博物館，但朱安住室，「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能恢復原狀，目前魯迅的一部分書箱放在這裏。」（《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頁55-72）這種處理是有目的的。

紹興與北京朱安的住室之被封閉，不公開讓人參觀，說明魯迅研究長久以來尚有許多範圍被劃為禁區，或者至少不鼓勵學者去探討。這只是很多禁區中其中最微小的一個範圍。學者們盡量不讓人去接觸魯迅與朱安的婚姻，主要是怕破壞了魯迅作為一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光輝形象。這些人大概作為「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不應該向封建家族妥協，接受媒妁之言的婚姻。後來又加上魯迅與許廣平同居，另外在上海定居，建立新的家庭，因此在許廣平逝世（1968）前，更為了她而把朱安當成一種忌諱。許多有關魯迅年譜、傳說、回憶錄的著作，從20年代到最近出版的，都深怕踏到地雷或冒犯眾怒似的，盡量避免打開這個秘密的「住房」，希望人們忘記或不知道魯迅

結婚那天晚上，魯迅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



魯迅紹興故居新台門的後屋。

生命中曾有過這件事。

因此我隨意翻閱一下我書架上的一些年譜和傳記，如王士菁的《魯迅傳》(1948)、鮑昌及邱文治的《魯迅年譜》(1979)、復旦大學等校《魯迅年譜》編寫組的《魯迅年譜》(1979)，都是一律採取點到為止的方法，把1906年從日本回紹興結婚的事一筆帶過，從此朱安便完全在魯迅的生活中消失了④。曾慶瑞的《魯迅評傳》在1981年才出版，紀念魯迅誕生一百週年，還是一筆帶過，不敢打破禁忌的框框。

這種禁區的形成，並不全是因有嚴刑重罰在禁止，往往是一些教條的口號，令大家有所忌諱。例如復旦等校編寫的那本《魯迅年譜》在「例言」中就說明「本書力求按照毛主席對魯迅的評價，着重表現魯迅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把魯迅當作革命家、全璧聖人和全人，甚至神的眼光與寫作態度，也深深影響了輯錄魯迅研究史料的人。從魯迅的二弟周作人到他家的工人王鶴照，都盡量閉口不談朱安，雖然兩人都與朱安曾住在同一屋簷下。周芾棠的《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由於敘述者皆非學術界人士，更加迴避這問題。

可是最令人驚訝的是，其他有關魯迅生活事迹的資料，也不敢把魯迅與朱安的不平常的夫妻生活包括進去。譬如《回憶魯迅資料輯錄》(1980)及《魯迅在紹興》(1981)，這兩本資料都很有系統和詳盡的輯錄各種有關資料，像《魯迅在紹興》，連魯迅小時拜為師的和尚龍師父都有一組資料，偏偏名門正娶的朱安的資料不敢整理。可見大家都懂得江湖規矩。

魯迅與朱安婚姻悲劇的禁區，幸好有另一批學者盡一切能力突破它，

甚至把它解除。早期不顧忌諱的有林辰的《魯迅事迹考》(1948)中的〈魯迅的婚姻生活〉，坦直的敘述了當時資料所允許的有關他們「夫妻」的生活。最近幾年，好些學者幾乎自動的把它解禁，薛綏之等人編的《魯迅生平史料匯編》(1983)第三輯中，就收錄了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的文章，詳述朱安與魯迅母子二人共住一屋的日常生活。其他資料中在介紹北京八道灣、磚塔胡同與西三條三所故居時，都把朱安女士的住屋說明，這事看來微不足道，其實那是一大突破，從來學者或魯迅親友都不敢把她看作魯迅家中的一份子。林非與劉再復的《魯迅傳》(1981)，也把第五章全部用來敘述魯迅與朱安的前後關係。余一卒的〈朱安女士〉一文，長達二十頁，是目前我所讀到最詳盡的、態度公正的關於魯迅與朱安婚後生活的文章。彭定安不但指出「魯迅和朱安，這是一個以前人們諱莫如深迴避躲閃」的問題，並指出「承認面對這個不幸的事實還不够，更重要的是探尋它的意義」。到了最近像李允經〈魯迅的婚姻與家庭〉更毫無保留的深入考證過去被認為忌諱的家庭問題⑤。

當我們把魯迅當作不是一個「完人」，不迴避事實，他便恢復原來生長於新舊時代交替的一個中國人的面貌，這個人才是真正的魯迅！

### 三 不准洩露魯迅應試的秘密

小說人物陳士成，經過十六次縣考失敗，好幾次掘藏不成，心靈經不起刺激，精神開始失常，眼前出現幻

紀念魯迅誕生一百週年，還是不敢打破禁忌的框框。這種禁區的形成，並不全是因有嚴刑重罰在禁止，往往是一些教條的口號，令大家有所忌諱。

覺。晚上回到屋子裏，看見白光，搖搖幌幌像一把白扇，他以為這是埋藏銀寶的記號，當他用鋤頭挖掘下去，結果泥土中有一塊下巴骨。後來他追逐白光到城外，結果失足掉落萬流湖淹死。

白光最早的來源應該是陳士成追逐終生的科舉考試及格。清朝末年縣考發榜時，為了便於計算，以每五十人姓名寫成一張圓圖。舊讀書人做人唯一的希望，就是決定於自己的姓名會不會出現在圓圖上。因此魯迅特意安排陳士成發狂時所見的白光圈，是從這些黑圈變成的。

為了瞭解小說所說「十二張榜的圓圖」，我發現魯迅傳記資料還有一個更嚴重的禁區，它比魯迅初婚事件及其與朱安以後的生活隱瞞得更加厲害。這是關於魯迅曾經參加紹興縣考的事件。如果魯迅沒有受過舊傳統的壓力，曾被逼讀私塾，又參加過縣考，沒有這種經驗，恐怕就寫不出像〈孔乙己〉、〈白光〉那樣有深度的有關舊文人在科舉考試下的悲劇。可是偏偏魯迅如此珍貴難得的舊經驗，許多學者卻要千方百計的去把它隱藏起來，這不是阻止我們去認識魯迅真正的生活與思想嗎？

周作人最早在《魯迅小說裏的人

物》裏透露魯迅在南京讀書時(1898年)，曾回到南京與弟弟周作人一道參加縣考，魯迅只參加一次初試，沒有去覆試，名字居然也出現在「大案」上三圖三十七(又作三十四)，即考得第137名(因每一圖由五十人的姓名構成)，後來他便回南京去了。親友覺得可惜，便請一位親戚當槍手去參加府試。結果考得八圖三十(即第380名)。最後一關沒有再派槍手去考(即院試)，因此沒有撈到秀才的名銜<sup>⑥</sup>。

像魯迅這種舊生活經驗，大概怕影響他作為一個革命家的光輝形象，絕大多數有關魯迅的年譜、傳記、生平資料，都隻字不提，或者用替他辯護的文字，一筆帶過，譬如復旦等校編的《魯迅年譜》說：「會稽縣舉行縣考，魯迅被本家叔輩拉去一同應試，他對科舉原無好感……。」(頁29)如果這是一項與革命有關的事件，《魯迅在紹興》之類的書，一定四處挖掘資料，把它發揚光大。

我個人的看法剛好相反，魯迅在婚姻和考縣試這方面的生活經驗，正是促使他創造出許多徬徨於新舊之間的小說人物的素材。我們如果把魯迅與舊社會有關係的生活層面切去，那是難於瞭解他的文學作品的。我的閱讀經驗告訴我，要探討魯迅小說散文

魯迅在南京讀書時曾與弟弟周作人一道參加縣考，只參加一次初試，沒有去覆試，名字居然也出現在「大案」上，即考得第137名。

像魯迅這種舊生活經驗，大概怕影響他作為一個革命家的光輝形象，絕大多數有關魯迅的資料，都隻字不提。



1927年，魯迅與許廣平開始共同生活。圖為他們與周建人合照。

的複雜性，千萬不要去讀目前許多有關魯迅的傳記！它只有阻止、妨礙我們去瞭解真正的魯迅。

#### 四 諱言《長明燈》初刊 《民國日報》

我在撰寫〈從口號到象徵：魯迅《長明燈》新論〉一文時，注意一下《長明燈》最早發表的刊物與日期，居然發現它的複雜性與秘密性<sup>⑦</sup>。魯迅成為現代作家中被研究得最徹底的一位，無任大小問題，都傾全國之力去挖掘材料，因此單單有關魯迅研究之資料的書，就多得難以計算。可是關於《長明燈》最初發表的刊物，官方出版的《魯迅全集》詮釋資料，卻一直說沒法正確查明，還有待研究，這真是令人難以相信，讓我舉出一些事實加以說明。

1958年版的《魯迅全集》的《長明燈》註釋說：「本篇最初可能發表於1925年3月的北京《民國日報》，因為一時未找到這一時期的該報，所以未能確定。」（二卷，頁55-56）這條註釋似有所隱瞞，是否實情如此，令人懷疑。到了1976年1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彷徨》單行本，索性不註明《長明燈》原來發表的刊物與日期，只指出寫作時期是「1925年2月28日」。根據1979年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魯迅年譜》編寫組的《魯迅年譜》，《長明燈》甚至被推到可能未發表的騙局裏，它說：「是否發表待查。」這本《魯迅年譜》在「例言」中強調為了學習和表現魯迅的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而編寫的。而《民國日報》是國民黨在北京辦的報紙，自然不願魯迅這個毛澤東製造的神話中的

無產階級革命家與國民黨拉上關係。

在中國大陸，往往官方傾全國之力研究魯迅，這些學者沒理由看不明白《魯迅日記》簡單的記載。1925年2月28日，他在《日記》裏記「……夜大風，成小說一篇。」3月1日又記載：「下午往民國日報館交寄邵元沖信並文稿。」邵元沖（1890-1936）是紹興同鄉，孫中山在北京時，曾任其行營機要主任秘書，兼北京《民國日報》社社長。後來邵元沖緊隨蔣介石，死於西安事變。而那篇小說稿，很早大家應知道就是《長明燈》。所以文末「1925年3月1日」是發稿日期，完稿是早一天晚上（2月28日）。同年3月5日至3月8日，分四次連載於《民國日報》的副刊<sup>⑧</sup>。

目前一些敢攻擊過去魯迅研究受「左」思潮影響、「表現出簡單化和絕對化的傾向」的出版物，便無所顧忌，說明《長明燈》是發表在《民國日報》，譬如陳根生《魯迅各篇問世之後》說：「二年後（1978）……人們在已故學者錢玄同的藏書中，無比欣喜地發現了《北京民國日報副鑄》1925年3月5日至8日上《長明燈》分四期連載的最初文字。」雖然他所說1978年才「發現」的事值得懷疑，看來是官方開禁而製造的一個藉口和理由，因為最後王永昌卻說在北京魯迅博物館找到《民國日報》，是魯迅研究室的一個職員告訴他的線索。這事實許多學者應早就知道<sup>⑨</sup>。

自從解禁後，像《魯迅著譯繫年目錄》（1981修定訂，原1962完成）及《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等書，都說明《長明燈》是原載於《民國日報》，而這些書的前面序言，都大罵過去研究魯迅的「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做法<sup>⑩</sup>。

我個人的看法剛好相反，魯迅在婚姻和考縣試這方面的生活經驗，正是促使他創造出許多徬徨於新舊之間的小說人物的素材。

《長明燈》於1925年分四次連載於《民國日報》的副刊，魯迅日記也有記載，但官方出版的《魯迅全集》詮釋資料，卻一直說沒法正確查明，還有待研究，這真是令人難以相信。

## 五 閩土與章運水之間

在神化魯迅的過程中，學者不但盡力消除、歪曲、遮掩事實，以免損害魯迅的光輝革命形象，連他小說中的人物也在保護之中。〈故鄉〉中的閩土被肯定為代表農民被舊制度損害的典型人物後，這位小說人物的原型人物章運水（也有其父親章福慶的影子）的家庭背景、後代子孫都作了徹底的調查和研究，簡直把他當作革命英雄人物看待。可是不管有關章運水的報告資料如何詳盡，大家都隱藏住一件事實，即最早由周作人洩露的，章運水原來形象與小說中的閩土有很大不同。他真人很庸俗迷信，婚後與村中一個寡婦要好，終於鬧到離婚，害他父親花了不少錢，全家從此沒好日子過，他們的窮困，主要還是由於家事引起的，與小說有很大出入。周作人和周建人的回憶都透露了這事實<sup>⑩</sup>。

除了周作人、周建人兄弟敢直言章運水的婚變與迷信，其他資料，都是一律強調章運水小時的英雄形象與老了以後被剝削的農民形象，像《回憶魯迅資料輯錄》、《魯迅在紹興》、《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都是把閩土原型人物當作小說人物來加以美化和思想化。魯迅自己一再強調，他「所寫的事迹，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發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sup>⑪</sup>

因此我們又何必為閩土的形象操心？幾十年來那樣多人為魯迅自己的形象，為他的小說人物操心實在沒有必要。我在上面只是舉出三個小例子來說明這種所謂「左傾」研究、「神化魯迅」傾向的嚴重性。

## 六 把象徵主義抽掉，放進寫實主義

前些時候，我在美國休假期間，因為要探討魯迅小說中象徵主義的意義與表現技巧，我細心的閱讀了《魯迅論創作》（1983）、《魯迅論文學與藝術》（1980）等選集<sup>⑫</sup>，主要是為了方便查閱，避免把整套《魯迅全集》借回家的麻煩。可是這種論文選的書，就如那些資料和研究專著，也極有力的反映出大陸魯迅研究禁區之存在。

現以王士菁負責編選的《魯迅論創作》來說明禁區之無所不在。這本書厚達755頁，編選人又是大陸資深的魯迅研究專家，他在〈編後記〉中，態度開明的贊成魯迅的主張：「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sup>⑬</sup>可是細讀詳查之下，魯迅一些極重要，而且又常被人徵引轉述的，有關魯迅論象徵主義的文章，卻沒有被選入。很顯然的，這不是由於不知，而是因為無形的禁區之劃分，而故意遺漏。譬如《暗澹的煙靄裏》譯後記，並沒有收納進去。魯迅認為安特萊夫（Leonid Andrejev, 1871-1919）所以能把人類的心靈與現實生活很有深度的寫進他的作品，是因為他同時運用了象徵主義。這是很好的另一個證據，說明大陸的魯迅研究常努力隱藏真實，企圖給讀者、學者製造一個假象：魯迅並不重視象徵主義。理由很簡單，在馬列主義文學批評裏，象徵主義文學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墮落現象。

目前研究魯迅小說的大陸與歐美學者，都深入分析其作品，發現魯迅不但描寫社會現實生活，也深入人類

〈故鄉〉中的閩土被肯定為代表農民被舊制度損害的典型人物後，原型人物章運水被當作革命英雄人物看待。他真人很庸俗迷信，婚後與村中一個寡婦要好，終於鬧到離婚，他們的窮困，主要還是由於家事引起的。

大陸的魯迅研究常努力隱藏真實，企圖給讀者、學者製造一個假象：魯迅並不重視象徵主義。理由很簡單，在馬列主義文學批評裏，象徵主義文學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墮落現象。

的心靈，他的表現法既寫實，又兼用象徵主義<sup>15</sup>。但是長期以來，不少大陸的學人努力製造一個假象，把魯迅說成是一個徹底的寫實主義者。怪不得早在1936年馮雪峰為《魯迅短篇小說集》捷克譯本寫序時，也特別強調魯迅的作品有寫實主義的色彩，受到當時左派奉為大師的托爾斯泰和高爾基的影響。魯迅看過初稿後，把他們兩個名字塗去，並說：「他們對我的影響是很小的，倒是安得烈夫(即安特萊夫)有些影響。」<sup>16</sup>

魯迅在翻譯迦爾洵《一篇很短的傳奇》的後面，寫了一篇後記，也沒有被收入《魯迅論創作》一書中，真是使人不解。在這篇後記中，魯迅談到象徵、博愛和人道主義<sup>17</sup>：

他的傑作《紅花》，敘一半狂人物，以紅花為世界上一切惡的象徵，在醫院中拚命擷取而死……

現在魯迅的《長明燈》與迦爾洵的《紅花》的文學姻緣是眾人皆知的事實，魯迅的狂人也以長明燈作為中國社會一切罪惡的象徵。這篇後記所以不被選進，恐怕是反映大陸許多學者不肯承認《長明燈》受《紅花》的影響。

在《魯迅論創作》，魯迅其他論象徵主義的文章也有被錄取的，如《苦悶的象徵》引言和《蘇俄的文藝論戰》前記<sup>18</sup>。這是因為象徵主義這字眼是在較安全健康的上下文之中出現，而魯迅也沒有大事歌頌它。

## 七 從神到人，從政治到文學

魯迅研究至今已有六十多年的歷

史，其間所發表的文章、已出版的專著和資料，不計其數，目前已有《魯迅研究史》之出版<sup>19</sup>。本文只是根據我最近撰寫《魯迅小說新論》時所遇到的幾個小小的「神化」魯迅的實例，發表一些感想。

近年來在逐漸解除一些禁區之後，大陸的學者重新檢討魯迅研究的工作，承認把魯迅當作神來評價的人是少了，但很多還是把魯迅當作一個全人，迴避不應迴避的事實<sup>20</sup>：

不能否認，在我們的研究工作中，也有左的思想影響，主要的表現是「神化魯迅」。或者至少也是要把魯迅當作完人來寫的，要讓他進孔廟去。有了這樣一個框子，也就不可能實事求是的進行研究了……

要把研究工作引向實事求是的方法上，很多研究資料便需要切實的重新編輯與出版，像上海魯迅紀念館編的《魯迅著譯繫年目錄》、《回憶魯迅資料輯錄》等我所參考過的，基本上都符合學術的條件，是一種具有建設性的工作。

至於評析工作，王富仁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代表了魯迅文學作品研究的一種新方向。王富仁承認，大陸長期以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政治態度的分析為綱的研究系統來分析《吶喊》和《彷徨》的政治意義，然而「人們愈來愈多地發現，它與魯迅的小說原作存在一個偏離角」：

這方面的弊病發生在這個研究系統的方法論上，它主要不是從《吶喊》和《彷徨》的獨特個性出發，不是從研究這個個性與其他事物的多方面的本質

王富仁承認，大陸長期以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各階級政治態度的分析為綱的研究系統來分析《吶喊》和《彷徨》的政治意義，然而「人們愈來愈多地發現，它與魯迅的小說原作存在一個偏離角」。



聯繫中探討它的思想意義，而是從以另外一個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的獨立思想體系去規範和評定這個獨立的個性<sup>①</sup>。

所以他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回到魯迅那裏去」，並且要求「首先發現並闡釋《吶喊》和《彷徨》的思想個性和藝術個性」<sup>②</sup>。

嚴家炎的論文〈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論《吶喊》《彷徨》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貢獻〉是另一研究的新起點。嚴家炎在探討魯迅的創作方法後，發現並肯定魯迅是一個開闢多種創作方法的作家，寫實、浪漫與象徵在他作品中都大量運用。他指出<sup>③</sup>：

它們都早已是客觀的實在。只是長期以來，或者由於認識上的限制，或者由於受了現實主義獨尊論的影響，我們往往較少提到魯迅小說中的浪漫主義（特別在1958年以前），而對象徵主義則乾脆視而不見，不承認它的存在。這就把魯迅小說的創作方法理解得相當狹窄，封閉了本來應該是寬廣的創作道路……

上引羅蓀、王富仁和嚴家炎的幾段話，充分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真正的魯迅，我們更需要重新評價魯迅的文學作品。從神到人，從政治到文學，我們尚有漫長的路要走！台灣當局對魯迅的戒嚴令也剛剛解除，台灣及海外一些學者「右傾」的偏見的視野也正要重新調正過來。太過受中國大陸左傾研究路線或反共政治影響的日本與西方學術界，也有待重整對魯迅的誤解與偏見。

我相信真正的魯迅在二十一世紀便會出現在世界各國的魯迅研究著作中。

## 註釋

① 王鶴照口述，周芾棠整理：《回憶魯迅先生》，見《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一輯（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頁134-50（特別是頁136）。此文又見周芾棠《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5。

② 引文見鮑昌、邱文治：《魯迅年譜》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頁53。

③ 余一卒：〈朱安女士〉，見《魯迅研究資料》第13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頁347-67；又見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薛綏立等編，《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頁476-86。

④ 王士菁：《魯迅傳》（原版新知書店，1948，香港：文學研究社，1971），頁54；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編寫組：《魯迅年譜》上下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頁66-77；鮑昌、邱文治：《魯迅年譜》上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頁52-3。

⑤ 余一卒：〈朱安女士〉，《魯迅研究資料》第13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頁347-67；彭定安《突破與超越：論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瀋陽：寧夏大學出版社，1987）；李允經：《魯迅的婚姻與家庭》（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詳論兩人關係及其對魯迅思想與生活的影響（頁39-57）。

⑥ 在《魯迅小說裏的人物》（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有兩個地方敘述魯迅參加縣考的經過，其一在縣考一條（頁122-4），其二在附錄的《舊日記裏的魯迅》（頁249-50）。周作人自己前後不一致的說魯迅「大案」考取三圖三十四和三圖三十七。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1970）中，也寫到魯迅縣考的事（頁50-3）。

⑦ 〈從口號到象徵：魯迅《長明燈》新論〉為我準備出版中的《魯迅小說新論》（台北：東大圖書，1992）一書中的一章，已發表在《學叢》第二期（1990年12月），頁239-68。

⑧ 關於魯迅與《民國日報》，可參考

從神到人，從政治到文學，我們尚有漫長的路要走！台灣當局對魯迅的戒嚴令也剛剛解除，台灣及海外一些學者「右傾」的偏見的視野也正要重新調正過來。

陳漱愈的討論，見《魯迅生平史料之匯編》第三輯，頁657-8，陳漱愈原來全文《魯迅在北京時期與一些報刊的關係》分上下兩次，刊於《吉林師大學報》1977年，期4及期5-6。又參考王永昌《〈長明燈〉發表出處是怎樣查明的？》，見《魯迅研究百題》（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149-52。

⑨ 陳根生：《魯迅各篇問世之後……》（上海：復旦大學，1986），頁124-32。王永昌親自參與尋找《民國日報》。見註⑧，陳文中所說1978年不正確，應在1977年之前。

⑩ 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著譯繫年目錄》（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頁83-4。這本繫年原在1962年刊於《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一、二輯）上，曾經修訂很多地方。《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頁657-8。

⑪ 周遐壽：《魯迅小說裏的人物》，頁52-3（〈閩士父子〉）；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頁190-1。

⑫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卷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頁106-10。

⑬ 《魯迅論文學與藝術》上、下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

⑭ 〈編後記〉，《魯迅論創作》，頁751、744。

⑮ 大陸方面的見解可以嚴家炎〈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為代表，見《北京大學紀念魯迅百年誕辰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頁183-209。西方學者則可以下面幾篇研究作代表：Leo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1987), p. 61; Patrick Hanan: "The Technique of Lu Hsun's Fic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4 (1974), pp. 53-97 (esp. p. 61); Double Fokkema: "Lu Xun: The Impact of Russian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4th Era*, ed. by Merle Gold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89-101.

⑯ 馮雪峰：〈關於魯迅在文學上的地位：1936年7月給捷克譯者寫的幾

句話〉，《魯迅的文學道路》（長沙：湖南長沙出版社，1980），頁14-5。關於魯迅與安特萊夫的文學關係，參考王富仁：《魯迅前期小說與俄羅斯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頁102-37。

⑰ 《魯迅全集》卷16，（譯叢補），頁601-2。

⑱ 《魯迅論創作》，頁387-9、390-1、388、370。

⑲ 袁良駿：《魯迅研究史》上冊（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下冊因改變出版社，書名易為《當代魯迅研究史》（西安：陝西教育出版社，1992）。

⑳ 羅蓀的〈序〉，《魯迅著譯繫年目錄》，頁2。關於大學如何利用魯迅研究來為政治服務，參考這兩篇論文：David Holm: "Lu Xun in the Period of 1936-1949: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Gorki", 及Merle Goldman: "The Political Use of Lu Xun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After", 兩篇論文均收集於 *Lu Xun and His Legacy*, ed. Leo Le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5), pp. 153-79, 180-96.

㉑㉒ 王富仁：〈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吶喊》《彷徨》綜論〉（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頁1-10。

㉓ 嚴家炎：〈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論《吶喊》《彷徨》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貢獻〉，《北京大學紀念魯迅百年誕辰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2），頁193。

王潤華 1972年獲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學位，曾任南洋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院長，現任教於該校中文系。近年代表作有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及《司空圖新論》，新作《魯迅小說新論》即將出版。